

转喻与话语的认知符号学分析

吴 莉¹, 刘立群²

(1. 黑龙江大学 西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2. 哈尔滨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认知符号学认为, 人类所有的认知活动都发生在符号系统内部, 即所有的认知过程都是符号过程, 反之亦然。转喻符号是由形式、事物和概念构成的三维实体; 转喻意指跨越形式世界、事物世界和概念世界三个本体域; 转喻表征是语言、现实和思维三者之间的互动与整合。从认知符号学的维度探讨转喻与话语的关系有助于人类全面和深刻地理解转喻的认知基础和运作机制。

[关键词] 转喻; 话语; 认知; 符号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2012)12-0176-04

转喻作为人类语言和思维的普遍现象, 是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长期以来, 转喻的探索经历了传统修辞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但是, 以往的研究成果更多关注的是转喻在词汇层面的作用, 而对于转喻的话语功能的探讨尚显不足。本文立足于跨学科的研究视角, 结合认知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研究成果, 强调只有将转喻置于话语分析的框架中, 其认知基础和运作机制才能得到更加充分的理解和全面的揭示。

一、转喻是意指过程

哲学家皮尔斯(Peirce)提出了符号系统的三元关系理论, 他将符号系统看作是密切相关的三个元素即符号形体、符号客体和符号释义构成的三元关系模型, 符号必须在三者的相互作用中才能被理解^[1]。具体说来, 符号形体是符号所呈现的形式, 符号客体是符号形体所代表的事物, 符号释义是对符号的解释。符号的意义不在于符号本身, 而在于对符号的解释。符号过程是一种行为或影响, 是符号形体、符号客体和符号释义三者之间的协作与互动, 这种三元关系决定了符号过程的本质。符号的动态性是符号和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 构成了符号学与认知科学两者关联的基础。奥格登(Ogden)和理查兹(Richards)用符号三角模型表示皮尔斯的三元关系符号系统, 他们所使用的术语是符号、所指物和思维(或所指)^[2], 三者分别与皮尔斯的符号形体、符号客体和符号释义相对应。

符号学理论涉及人类社会所有的自然现象, 包括语言及图像、音乐、舞蹈和艺术等非语言领域。人类对转喻符号的关注最早出现在柏拉图(Plato)对符号的任意性和本质的讨论;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也借用转喻来论证符号的任意性; 皮尔斯区分出三种不同类型的符号: 相似符号、索引符号和象征符号, 隐喻属于相似符号, 转喻属于索引符号^[1]。可见, 皮尔斯的符号学原理蕴涵了转喻现象与符号产生机制的相通之处。意指是符号的意义, 包括意义的生成过程及所生成的意义, 它以思维和推理为基础。转喻在人类思维和推理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转喻是两个实体之间的一种蕴涵关系, 是其中一个事物通过某种关系(邻近关系或因果关系)产生其自身意义之外的意指过程。基于本体论, 瑞登(Radden)和考维克西斯(K. Vecses)区分出三种不同类型的本体域: 形式世界、事物世界和概念世界^[3], 分别对应奥格登和理查兹提出的符号三角模型中的三个实体: 符号、所指物和思维。转喻过程不

[收稿日期] 2012-07-17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0D018);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2512265)

[作者简介] 吴莉(1966-), 女, 吉林白城人, 教授, 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

仅包含意义转移,它还是连接不同本体域的认知过程,发生在概念层次(如范畴化、原型、思维、推理),涉及自然语言的各个方面(如词汇、短语、句子、段落、篇章),具有不同的语言功能(如指称、叙述、言语行为)。瑞登和考维克西斯还发现,处于相同符号单位且属于不同本体域的实体所构成的理想化认知模型生成符号转喻和指称转喻,处于相同本体域且属于不同符号单位的实体所构成的理想化认知模型生成概念转喻^[3],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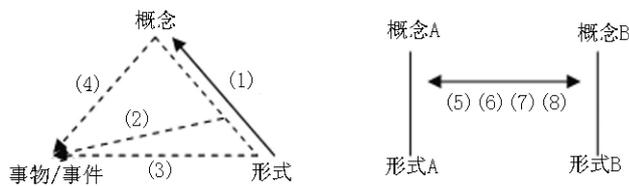


图1. 符号转喻、指称转喻和概念转喻

图中箭头(1)表示符号转喻,箭头(2)、(3)、(4)表示三种不同类型的指称转喻,箭头(5)、(6)、(7)、(8)表示四种不同类型的概念转喻。因此,在认知符号学的视野中,转喻是构成形式、事物和概念三者关系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转喻类似于符号,它是包含形式、事物和概念的三维实体,其中的形式对应皮尔斯

符号系统中的符号形体,事物对应符号客体,概念对应符号释义。

二、转喻是表征过程

卡宁汉姆(Cunningham)继承了皮尔斯的符号学观点,主张认知是符号的作用或者符号化,通过符号构建结构或经验^[4]。人类所有的认知活动(如体验、感知和表征)都发生在符号系统之内,所有的认知过程都是符号过程。根据本体论,表征是描述和解释概念本质的一种方法,人类的语言和思维皆产生于表征系统内部。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与表征的概念有相通之处,与人类的认知密切相关。皮尔斯指出,“表征即替代;换言之,在处于某种关系的两个事物中,某一个体出于某种目的认为其中一个事物等同于另一个事物。”^[1]由此可见,皮尔斯将表征界定为表征的解读者对符号的认知操作,或者符号与物体之间的关系。从认知符号学的角度看,现实世界通过符号形式得以表征,表征通过符号系统而产生。在认知和符号的视域中,概念形式是第一位的,而不是物质形式。

转喻不是边缘化的语义现象,而是意义得以表征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艾尔-沙拉菲(Al-Sharafi)认为,转喻意指是能指体现与它以某种方式联系的所指的表征过程^[5]。表征是转喻的功能,转喻表征是语言、现实和思维三者之间的互动与整合。转喻意指表征通常由邻近性和因果性两个原则体现,邻近性原则体现“部分代替整体”和“整体代替部分”两种转喻关系,因果性原则体现“原因代替结果”和“结果代替原因”两种转喻关系^[5]。

转喻意指表征符合人类对百科知识结构的普遍理解。根据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观,人类的百科知识来自对世界的体验,百科知识在帮助人类理解日常的话语交际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理解话语之所发生就是理解世界之所发生,可以说,话语理解主要是建立在人类对世界的体验,而源自体验的百科知识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典型情景的心理表征。在话语生成的过程中,心理表征可以预测某个话语所描述的特定的情景内容。人类大脑通过接受话语中的关键词或语境的刺激,激活人类的百科知识,并凭此解读话语的意义。约翰逊-莱尔德(Johnson-Laird)也指出,“与随机组合的句子不同,话语连贯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建立该话语的心理模型。”^[6]人类借助高度抽象化的心理模型对人类经验进行分析和解释。人类通过对世界的体验而产生心理表征,心理表征在呈现物体、事件、状态、顺序、世界情景、社会和心理活动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布朗(Brown)和于勒(Yule)通过对话语理解的心理学研究发现,在某个特定的情景得到描述后,心理表征可以解释话语的接受者能够预测并可及的信息^[7]。心理表征的特点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规约知识,以特定的组织方式储存在人类的记忆中。此外,话语的心理表征在人类大脑中不是一次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若干阶段的尝试和纠错^[8]。

艾尔-沙拉菲认为,百科知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区分为两大类:描述性知识(何物)和程序性知识(如何);对于描述性知识的理解,人类通常借助邻近性原则来解释话语中各元素之间的关系;对于程序性知识的理解,人类通常借助因果性原则来解释话语中各元素之间的关系^[5]。如前所述,邻近性原则由“部分代替整体”和“整体代替部分”两种关系体现,因果性原则由“原因代替结果”和“结果代替原因”两种关系体现。因此,百科知识的转喻表征模型如图2所示:

三、话语是符号构造体

目前,符号学和认知语言学都有朝向话语分析领域发展的趋势,而认知符号学更是将话语看作是重

要的研究领域和探索目标。可以说,没有话语就没有社会现实,不理解话语人类就不能够理解世界和人类经验,甚至人类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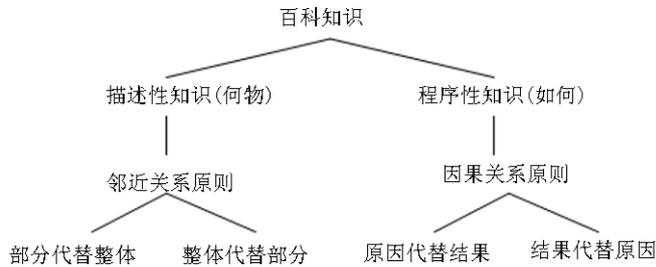


图2. 百科知识的转喻表征模型

皮尔斯认为,只有当世界和人成为符号并且体现为话语的时候,意指才能产生^[1]。冯塔尼尔(Fon-tanille)指出,意指过程的系统化是话语的特征,也就是说,话语的发展是系统性的,呈现出一个有序的意指排列,符号系统从最简单到最复杂得以流畅地表达;话语不仅允许人类去理解固定的和常规的符号,还有符号行为本身,因此话语也是行为的体现^[9]。话语不是提供人类语言能力的自动装置,而是表达话语的人类存在或者能感知的实体。人类在处理话语的时候,能够意识到话语中固定的和常规的东西不仅仅是独特的符号,话语的特征还包括全局规划人类的经验与知识表征的能力。

索绪尔(Saussure)最早提出符号系统的轴列关系,即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横组合关系是指各个语言符号之间的线性关系,纵聚合关系是指可能出现在同一个位置且功能相同的各个语言符号之间的垂直关系,轴列关系描述了符号系统的运作机制。雅格布森(Jakobson)最早将隐喻和转喻放在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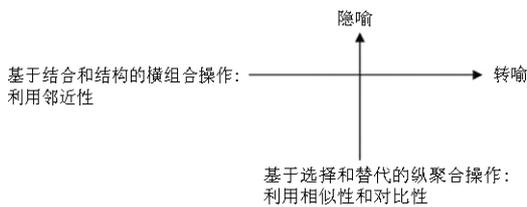


图3. 隐喻符号和转喻符号的轴列关系模型

号的轴列关系中,并研究两者在话语构建中的不同功能,见图3:

雅格布森发现,“话语的发展可以沿着两个不同的语义途径:一个主题可以通过与另一个主题的相似性或邻近性而展开。隐喻方法是产生相似性的最适当的术语,转喻方法是产生邻近性的最适当的术语,因为两者分别以最简练的方式表达了相似性和邻近性。”^[10]换言之,雅格布森将隐喻和转喻看作是两个基

本的意指过程,话语信息是通过横向运动的转喻关系和纵向运动的隐喻关系的相互作用而建立起来。然而,以巴塞罗那(Barcelona)为代表的一些认知语言学家却认为,转喻对人类语言的产生比隐喻更具有本源性^[11]。

四、话语是认知构造体

认知语言学不仅是关于词汇、句法、语义和语用的理论,还涉及语言结构的话语层面,包括话语生成和话语理解。认知视角的话语分析以人类为中心去探索话语交际活动的心理表征。

认知语言学认为,概念系统基于人类对世界的感知和对世界的范畴化。在不断地观察世界和作用于世界的过程中,人类对世界中的实体产生深刻的理解,人类对世界的经验也随之反映在人类的语言和思维中。在理解口语和书面语时,信息不仅被复制到人类的大脑,人类还积极地构建各种认知表征。认知表征不仅与词汇、句法、语义和语用相关,还与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等其他方面相关。在话语的生成和理解过程中,每一种认知表征的功能都同等重要。人类大脑中的认知表征细致丰富,因为它们与人类记忆库中存储的经验或百科知识密切相关。百科知识的表征是相互关联的概念、命题和事物所构成的网络。因此,话语理解就是在人类的记忆库中检索已存储的知识,并将它们与所需要处理的话语联系起来。

一直以来,认知语言学侧重研究语言意义的概念层面和语用层面,但是还仅仅限于单独的句子或简单的命题,而不是较大的话语单位。一般认为,话语的恰当形式就是话语的意义,尤其是组成话语的句子意义是否彼此相关并构成连贯的信息,连贯的话语需要来自并通向连贯的表征。诺特(Knott)的研究对话语分析和认知语言学两者的密切关系进行了概括^[12]:第一,人类的大脑对世界的范畴化是无意识的。日常语言中的表达法已经提供人类的大脑运作机制的实证。例如,人们选择使用某一个连接词对相关事件进行范畴化,这可以看作是解释语言使用者思维方式的范畴化行为。第二,语言结构和语言过

程应该同等对待,而不是将两者截然分开。作为一个理想的语言结构层面,话语恰如其分地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呈现出通常认知现象才具有的连贯性,而这一点与话语本身的形式无关。

五、转喻与话语的符号 - 认知模型

话语的构建与解读是通过语言、语境和认知三者之间的互动而产生。话语不仅是语言衔接手段的产物,还是人类的预测、期待和协调等一系列认知操作的意义生成过程。如前所述,转喻系统的三元关系模型的元素与符号系统的三元关系模型的元素互动产生转喻符号意指,图4是转喻、符号和话语三个三元模型的整合,表明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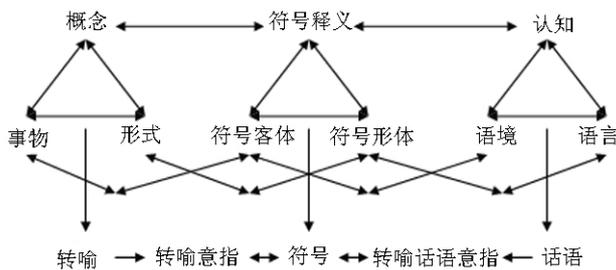


图4. 转喻、符号与话语的互动关系模型

转喻与话语的符号 - 认知模型是基于瑞登和考维克西斯提出的本体转喻的三元关系模型,即转喻表征体现了形式(或语言)、事物(或现实)和概念(或思维)三个本体域,三者之间以转喻的方式形成符号和认知的互动,使话语交际成为一个动态的整体,其中蕴涵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结构相关的转喻表征过程。因此,在认知符号学的框架中,

转喻对话语衔接和话语连贯的构建是通过两个不同层面的连结实现的。话语衔接是通过四种不同的符号 - 形式连结(形式代替形式、形式代替事物、形式代替概念、概念代替形式)而实现;话语连贯是通过四种不同的符号 - 认知连结(概念代替概念、概念代替事物、事物代替概念、事物代替事物)而实现,符号 - 形式连结(即话语衔接)是符号 - 认知连结(即话语连贯)的前提和基础。

[参考文献]

[1] Peirce, C. S. Collected Writings [M]. (8 vols.). (eds. Hartshorne, C., P. Weiss and A. W. Burk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 58: 2. 172, 273.

[2] Ogden, C. K. and I. A.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 [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23.

[3] Radden, G. and Z. Kövecses.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 [A]. In K - U. Panther and G.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17 - 59.

[4] 胡壮麟. 认知符号学[J]. 外语学刊, 2010, (5): 20 - 25.

[5] Al-Sharafi, A. G. M. Textual Metonymy: A Semiotic Approach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6] Johnson-Laird, P. N. Mental Models: Towards a cognitive science of language, inference, and consciousness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370.

[7] Brown, G. and G. Yule. Discourse Analysi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8] Dooley, R. A. and S. H. Levinsohn. Analyzing Discourse: A Manual of Basic Concept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8.

[9] Fontanille, J. The Semiotics of Discourse [M]. (trans. Heidi Bostic). New York: Peter Lang, 2006.

[10] Jakobson, R. The metaphoric and metonymic poles [A]. In Dirven, R. and R. Pörings (ed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C].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2: 42.

[11] Barcelona, A. On the plausibility of claiming a metonymic motivation for conceptual metaphor [A]. In Barcelona, A.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C].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3: 31 - 58.

[12] Knott, A., T. Sanders and J. Oberlander. Levels of representation in discourse relation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1, (3): 197 - 209.

[责任编辑: 常延廷 程石磊]